

胡风家书

[illegible]

何和義子（字）... 侯曾輝謹切同公氏日攝錄

侯曾懌德切同余日恆錄

昨天七時半滑南河
 前鋒開車，五時到
 津道，不博的小站，如
 拍館非常榮幸，而
 準備得很好。下車，
 當時強得很，有飯，看
 今天到津十分左右
 便孔揮下去了。要將很
 好要定。不得已，托車
 人找一找。如車時，在
 實，我寫上，這書不是

K825.6

145-3

胡风家书

晓风 选编

下車了。如
 都有現
 范社
 黃、王
 也寫下了一些備忘
 後面幾句小語，
 寫個條，他後不
 從左而後居了也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家书/晓风选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309-05457-6

I. 胡… II. 晓… III. 胡风-书信集-1933—1980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379 号

胡风家书

晓 风 选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选题策划 罗晓荷
责任编辑 孙 晶
装帧设计 罗 洪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5.75 插页 4
字 数 448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5457-6/K · 195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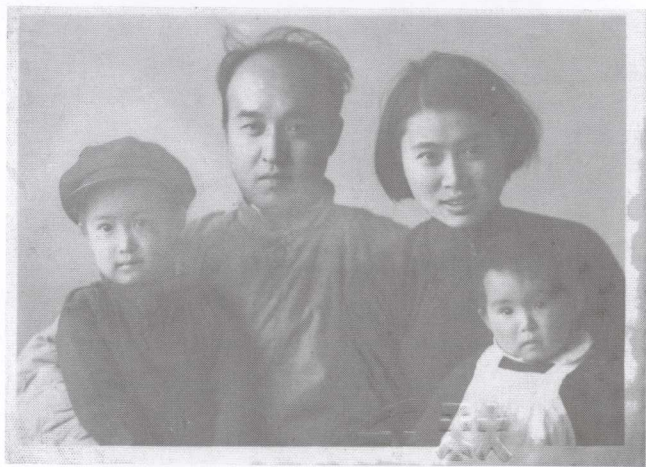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胡风与夫人梅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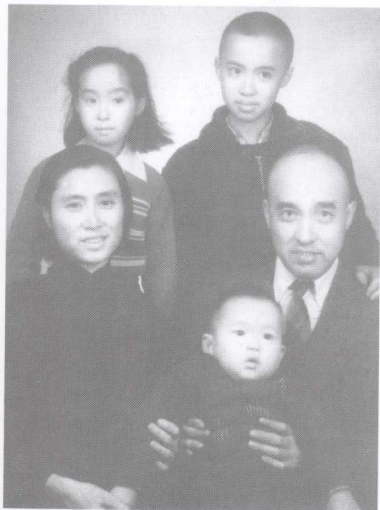
1934 年胡风和梅志在上海



1940 年在重庆北碚，胡风夫妇与儿子晓谷（左）、女儿晓风（右）。



1949 年开政协协会时，胡风在北京华文学校。



1948 年，胡风全家。胡风怀中为幼子晓山。



1982 年春末，在北京前三门寓所门前，胡风与梅志。

昨天七時半滑南河，今早五時到天津。下車。取行李。
 所轉開車，五時到天津。南河天津，京都有歡迎會。可
 津道長，不帶的小站止都有歡迎會。
 招待非常隆重。兩旁是毛鵬的殷勤招待。館長及其著
 名滿清留學。一下車，張和就說可以多加些些時分。范社是
 當時招待很有趣。前清由整中作此招待會。
 今天到津十分在左。
 張孔祥（方），當時很
 的。不帶。不帶。不帶。不帶。
 人找一找。初上車時，在車
 旁，我馬上想，這若不是張

們。這是一點，可以帶到工人張某處。是張某也成長了。
 張某在時間，未見其人。
 以我一重（張某），一重張某時。
 已經有了兩重（張某）在張某，勢必在張某（張某）。張某說
 張某（張某），但和張某，張某，是張某寫的。
 昨（張某），張某（張某），張某
 張某（張某）張某（張某）

胡的張某
 九、二十二日

張某（張某）張某（張某）

编辑说明

本书辑入胡风家书三百五十三封,其中致夫人梅志的书信三百三十封。这些书信曾由《新文学史料》发表过三十三封,《书城》杂志发表过七封,在1989年出版的《胡风书信集》和梅志所著《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两书中也各选用过一封,其余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由于这些书信写作年代跨度较大,为便于阅读和检索,本书以胡风与梅志睽隔之期为单元,按时间顺序编为九集。胡风在不同时期写给子女张晓谷、张晓风、张晓山和长媳高庆莘的信件存有二十三封,作为附集列于书后。

其他有关编辑事项说明如下:

一、信件的整理、编辑工作尽可能保存著者文字原貌,除繁(异)体字和明显的错别字外,一般不作改动,信中有些词语用字是当时的语文习惯,可能不合现今书写规范,亦均予保留。

二、书信原件中个别阙文和不易认清的字以□代之,一些明显的缺漏酌视文意补入并括以[]号,有存疑处用[?]表示。

三、各集中信件分别编号,均按写作日期排列。

四、少数信中有个别地方作了删节处理,凡标有[略]的字样,是信件提供人所作的删除,标有[……]者是编辑的处理。个别需要隐去的人名代之以××或×××

五、本书注释涉及人名、地名、书名、机构名称和某些事件等。考虑到篇幅因素,所有注释条目尽可能采用简略形式,在人名注释中主要交代人物当时的身份、职务和相关事况,一般不再述及以后的情形。由于解放前后一段时间内人事变动甚剧,有些人物未能获得准确的资料,注文中只能概约言之。注释由编者张晓风撰写,本书特约策划人李庆西、罗晓荷作了增补与修订。

序

陈思和

《胡风家书》的出版,其意义不仅在胡风研究领域,而是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提供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献。我原来以为,在胡风研究领域,随着《胡风全集》(10卷本,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作家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期待主要是来自更高层面的有关胡风事件的档案解密。胡风事件发生于1955年,中共党内对胡风的批判更加早些,大约从1948年开始,离现在都在五十年以上,当事人也所剩无几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地解开这场文坛冤案的谜底。但是从受难者的精神现象的研究来说,这一本《胡风家书》无疑是提供了最新也是最完整的信息。

我查核了《胡风全集》的第九卷书信卷,胡风给梅志的信只有一封,是在秦城监狱里发出的信。再查第十卷日记卷,对于胡风写信的主要背景可有大致的了解,但是日记极为简约,倒是家书,不但有较为详细的细节记载,还有较为详细的内心苦恼的披露。作为诗人的胡风,他的感情的表述决不是独白式的,他的倾诉需要有对象,而梅志则是他最为知心的倾诉对象。《胡风家书》收录了胡风致梅志的全部信件,从1933年胡风刚认识梅志,向她求爱开始,一直到1965年出秦城监狱前的通信。共有330封之多,是他们一生书信的全部。对于这一对历尽战乱、磨难、监狱、迫害的患难夫妇来说,这几乎是奇迹上的奇迹。从1949年胡风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再转辗到北京参与新政权的文艺活动,到1953年7月他在北京买了房子,决定举家北迁定居为止,是胡风生命史上最为难堪的时期。在之前,他作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左翼文艺评论家,鲁迅先生的精神传人,活跃在烽火弥漫的文坛上,以自己的美

学思想影响了一大批青年诗人、作家和文艺爱好者，他主编的《七月》成为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在之后，他定居北京以后着手撰写号称“三十万言书”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是胡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最后的进言和贡献，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见解和对于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政治上“假、大、空”理论的致命性的批驳，从而使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接下来是二十多年牢狱之灾，那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我现在关注的是，那一段最为难堪、彷徨的时期中，胡风的精神世界是怎么发生变化的？他是怎样从进入新世界的狂喜、幻想并且希望取信于新政府的最高领导，到他一步步发现事与愿违、自己出于盲目的自信和单纯的他信而陷于了难以脱身的困境。他的客观环境在变化中，他的主观认识也在变化中，这种变化是痛苦的，同时也遇到了他的自信本能的顽强反抗。他是经过了几年痛苦的自我搏斗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在1953年初的家信中他终于承认：“可见一切都在酝酿之中，所以，我的事也就不能最后决定的。现在只求能解决暂住的房子和搬家问题。”并且痛苦的说：“我已不存任何幻想了”。这一时期胡风的内心痛苦是无法想象的，而他唯一倾诉的对象只有梅志，所以这批书信的公开发表，对于我们了解胡风当年的心迹转变和认识深化，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由此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胡风在这几年中放弃理论活动，转而创作歌颂领袖的长诗和趋时的报告文学，一次又一次地写作遵命文学，一次又一次地滞留北京，一次又一次地百无聊赖周旋于文坛官场，等候新政权对他的重新起用，都是基于他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本能的反抗，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处境。抗战以来，胡风的《七月》、茅盾的《文艺阵地》、郭沫若的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在延安的文艺活动（如周扬领导下的鲁艺和丁玲等人主持的延安“文抗”等）形成了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的多角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同一条战线下的多元追求，也有群雄逐鹿的宗派冲突，但是这一均势到了1948年以后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他各元都建立了联合统一战

线,而胡风一元却被排斥为异端,成了与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同列的批判对象。这种关键性的变化究竟发生在何时?我们至今尚未掌握有说服力的材料。王元化先生曾经在《我和胡风二三事》中透露过一点党内批判胡风的信息,时间大约还是在1947—1948年,这条信息相当重要,但似乎还没有人作进一步的旁证。如果再往上推,那就是1945年的《论主观》批判了。而在《胡风家书》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条新的信息,在1938年2月3日的信中所说的:“还有,《七月》发生了问题,我感到无比地气闷。这回的问题,不是官方,而是自己。潘汉年等把子民找去,要他不要做发行人,至于我,顶好到临汾去,由我自己决定云。……和我站在一起的只有奚如一个。”吴奚如在武汉时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既然他参与了潘汉年“等”的意见,可见这不是潘汉年个人,也不是胡风后来理解的“创造社”宗派的意见了。这些纠葛似乎不见其他文学史资料。我查了胡风回忆录,胡风只写到了武汉时期胡愈之建议《七月》与《文艺阵地》的合并,被胡风拒绝,但没有提到潘汉年的意见。现在从这条信息来看,胡风作为异端的被确认,很可能在抗战初期已经在中共党内有了某种迹象。这与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时期在中共党内领导人心目中,因为鲁迅冯雪峰的背景使得胡风暂占上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然,胡风在抗战中仍然得到了中共领导的支持,他主编的《七月》也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胡风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异端角色已被派定,他的不断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方向的努力和幻想,注定将得到极为痛苦的挫败与打击。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中共领导一开始就把胡风放在敌对的位置上,确实是没有的,否则就不能解释周恩来多次从资金上支持胡风办刊物。中共党组织在40年代末发起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有意识的批判,很清楚是为了提醒胡风要意识到自己的异端立场,暗示他这是一种错误,但并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的意图。新政权成立后,有关方面多次想安排胡风从事具体工作,但必须是在他人(周扬、丁玲、冯雪峰等“党”的化身)的领导监督之下工作,希望他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改变自己的异端立场,在党

的规范下发挥自己的作用。但胡风压根就没有意识到高层领导的这一个意图,所以他才会一次次拒绝接受新政权对他的具体工作安排,而不厌其烦地要求直接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约谈”,其实他是企图通过高层对话来超越周扬、冯雪峰等人,让最高当局直接了解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与能量,以便让他发挥真正的“战斗”作用。为此,从1949年到1953年,他在北京滞留了大部分的时间,焦虑、烦躁、期盼、苦闷、破灭之情绪郁结于心,都真实地保留在他给梅志的书信中。

在1953年2月15日的家信中胡风抱歉地对梅志说:“从前,无论怎样苦法,过年我们还总是守在一起过的。但了解放以后,反而每一次过年都是在能不能在一起的焦躁中度过的。今年,终于不在一起过了。”胡风当然不知道,再过两年以后,难以想象的灾难将把他推向“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的悲惨境地,但是,即使是当时,“眼里朦胧望圣旗”的悲剧正在拉开帷幕,这个家庭已经被阴云笼罩了。现在的青年人也许难以理解,当时北京上海即使两地相隔,也不是遥远到参商难见,胡风在北京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公务在身,为什么连过年都不得归家,却在信中两地相思苦苦倾诉?我们仔细阅读家书,就会感受到怎样一种深刻的焦虑在折磨着胡风,使他一时一刻都难以离开北京这个圣旗所在的“圣地”。我有时突发奇想,如果胡风在1953年没有离开上海北上定居,或者他也没有热衷于滞留北京等候圣音,干脆安下心来在上海过一阵平凡人的太平日子(用胡风的话说,是做“太平犬”),谈笑者有彭柏山、刘雪苇等深谙党内三昧的资深领导,往来者有贾植芳、满涛这些正直睿智的学者,也许,他还不至于如此冲动如此自信如此盲目地为了一个政治目标而几年折腾一朝覆巢。但是如果这样,那胡风就不是胡风,文学史也会重写,也许这场灾难会以其他形式出现而延宕许多年,也许当代文学理论史上再也不会有“三十万言书”那种可歌可泣的直谏文字了。

读完这部书稿,我最有揪心之感的是胡风的夫人梅志,我不想从很高的角度来评价这位受难者的妻子——其实,对这样的中国女性,无论怎样评价

都是不会过高的——但我更希望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妻子角度来评价她,对她更是充满了敬意。梅志与胡风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结识而结合,相爱而相知。梅志小胡风十二岁,胡风当时作为一个留日学生、日共党员回国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知识分子,而梅志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女性,她的世界观的形成很大部分是受了胡风的影响。胡风是个典型的流浪型知识分子,他一生风雨奔波,很少有安定温馨的时分,然而在这种动荡不安定的岁月里,梅志却成了胡风最依赖的精神家园、最忠实的倾诉对象,最后,又成为他的重要的助手。他们竟一起承担了旷世奇冤,磨难中度过艰难一生。当我读着胡风书信如同听着笼中之豹的无望怒吼时,心里不由联想,梅志在那几年是如何承受这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精神折磨?而她又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那颗受伤的心灵?这一切,确是我最想了解的。幸而,从《胡风家书》的编后记里获知梅志致胡风的书信如今也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真希望晓风在不久的将来能把梅志家信也都整理出来,一起发表,让这位伟大女性的风范长存人间。我想,读者也是会这样期待的。

2007年2月14日于黑水斋

| 目录 |

编辑说明	1
序	陈思和 1
第一集 上海	
1933年□月29日至1933年12月5日	1
第二集 南京—上海—武汉	
1937年7月21日至1938年9月21日	12
第三集 南京	
1947年6月22日至1947年6月24日	74
第四集 香港—天津—北平	
1949年1月5日至1949年7月20日	77
第五集 北平〔京〕	
1949年9月8日至1950年2月4日	103
第六集 济南—北京	
1950年9月21日至1951年1月24日	158
第七集 北京—武汉—宜昌—重庆—巴县—重庆—北京	
1951年4月22日至1952年1月9日	210
第八集 北京—沈阳—大赉—沈阳—北京	
1952年7月19日至1955年1月21日	276
第九集 北京（秦城监狱）	
1965年8月13日至1965年12月□日	432
附集 南京—天津—北平（京）—成都—北京	
1947年6月22日至1980年4月16日	456
编后记	晓 风 487

第一集 | 上海

1933年□月29日至1933年12月5日

胡风于1933年6月从日本被驱逐回到上海,先任左联宣传部长,后任左联书记,笔名为“谷非”。不久,即结识左联盟员屠珣华(梅志),并领导她的工作。在工作中彼此建立了感情,于这年的年底开始了共同生活。这里收录的10封信写于他们共同生活前,内容可参见梅志著《我与胡风》(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

1 → 1933年□月29日自上海

冰妹: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源,只是学着他们这样叫。)

一切都没有头绪,明天不来也好,因为来了,也不能有具体的决定,累你晒一次太阳而已。你学校的事弄好了没有?四五天之内再写信约你。

有一件事。上次你是不是叫了我一句“张先生”?不对呵,听着心里怪抱歉的。我有两三个名字,随便叫哪一个都可以。万一还要表示客气,当作哥哥叫也行。在这一行朋友里面,我是被喊作大哥的。

非 廿九上午

2 → 1933年9月9日自上海

冰妹:

我今天等了半点钟,不见你来。过细想了一想,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未

必你到南京去了么？我似乎听见你说过这样的话，但没有想到你马上会去，否则要托你带东西的呀！回来后请即通知我，信由“福煦路 803 中山文化教育馆潘蕙田先生”转张光人收。

非 九.九下午四时

3 → 1933 年□月 12 日自上海

冰妹：

那天该多等你一会的，这样说来。过了那久才约你，是我底不好。

我上午十时左右到十二时大概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你十一时左右来顶好。我想很快地看见你。虽然我不愿在这样无聊的地方见你。

等你。

非 十二日

4 → 1933 年 10 月 28 日自上海

冰：

你看，我并没有搬进那间房子去。过后，忽然觉得那间房子太阴暗，不干净，就这样硬丢了五元。我向两个人谈到过，于是他们大笑，笑我傻。呜呼，傻名将从此传播得更大乎？

昨天又看了一间，便宜，宽大，但也有缺点。也许明天搬去。你来，还得先到这儿来找我。上午总在，如下午，就先通知一下，免得“扑空”。——上次，既找了几次，为什么不留一个字呢，敢问？老实告诉你罢：老不来玩，我几乎要生气了呢。

祝高兴！

古飞 十.廿八

5 → 1933年11月6日自上海①

冰：

你上了车以后我才想到：我应该要你陪我走到法大马路②，我们同时上车的。想着这样的事，把手插进口袋里向法大马路走去。如果和你一样会吹口笛，那时候就更像一个电影场面了。——因为你喜欢看电影专刊，所以我选了这个说法。

半月以来，我生活在一个奇怪的遭遇里面，好像在写一篇传奇故事一样。我虽然尽量地在分析自己，但摆脱不开，唯一的希望是希望你来，给我力量。然而，你老不来。冰，我喜欢你底“世故”，因为生活告诉了我它在人生道路上的用处，但现在此刻我却恨你底“世故”，你把它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了。

然而，那一天你终于来了。那一天我算是得了救。我硬拖着你说着，但心里老在叫着：冰呵，你应该更高兴一点，更天真一点，有什么压在你底心上呢？！

然而，那天以后，事情更是急转直下，我好像完全被包在暴风雨里面了。事情再不能够发展下去，我需要——需要什么呢？我决不定一个适当的字呵……

冰，你来，我要把我全部的遭遇告诉你了。我再不要“矜持”，你也权且放下你底“世故”罢。这些事你完全不晓得，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告诉了你会有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但我决定了已经非告诉你不可了！

冰，你来！明天上午如果接到了这信，下午三点以前一定要来。有课也要丢下，有事也要丢下。如果信没有到，或者到了你不在家的话，九号（因为八号搬家）下午一点以前一定要来！可是，我对你说，顶好是明天来，因为，事情太急迫了，越早越好！

① 此信在信纸上标明“№1”。

② 法大马路，今上海金陵东路。